



中国大众文学丛书

情中情

曾辉

情 中 情

作 者 曾 辉

责任编辑 韩光玉

吴丹青

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省信阳市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大32开本 13印张 303千字

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册 定价5.00元

ISBN 7-80538-184-4/I·72



作家小传

曾辉，汉族，1943年1月1日（阴历）出生在湖南省澧县沙河村一个穷苦农民家庭里。原名曾繁荣。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196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当过农工、中小学教师、新闻记者、《澧县报》社副社长、副总编，写出了一批有思想特色的新闻报导和报告文学。198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中国大众文学学会。1987年结业于鲁迅文学院。现任湖南省常德市文联副主席。

曾辉长期生活在湖南农村，对农村生活非常熟悉。1964年开始从事业余文艺创作。著有《八月雪》、《财女》、《情中情》三部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散见各报刊的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新旧体诗词等文学作品多篇。其中《财女》获丁玲文学奖。

序

中国大众文学学会和中原农民出版社、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北岳文艺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花山文艺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商定，共同编辑出版一套《中国大众文学丛书》。这是一项十分适时的、富有远见的计划。在令人振奋的同时又不免令人眼花缭乱的今日文坛上，编辑出版优秀的大众文学作品并纳入一套丛书，其意义不仅在于向广大读者提供一批经过精心选择的、为他们喜闻乐见的文学读物，以满足他们对文学艺术的日益增长的需求，而且还在于用好的和比较好的作品作为例证，以提倡和推动具有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的文学创作蓬勃健康地发展。

去年五月，中国大众文学学会成立的时候，我曾讲过三句话表示我对学会的祝贺。这三句话是：“第一句话：我一直认为，周恩来同志提出的文艺要‘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口号是正确的，我们今天仍然要坚持，仍然应该把它看成是发展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的重要指导原则。第二句话：人民大众喜闻乐见和雅俗共赏，是高层次的、不是低层次的审美境界，是我们应当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一条重要的美学原则。第三句话：希望我们学会的同志不务虚名，多做实事。”这三句话所表达的是我一向所坚持的看法，时至今日我依然是这样看的。

众所周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拨乱反正、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我国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破除“左”的束缚，贯彻“两个基本点”，在党中央提出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

主义服务”的方向即总方针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一系列具体方针政策的指引下，汹涌澎湃、汪洋恣肆地发展起来。从题材、体裁、文体、风格、手法到思想内容都变得空前广阔和多样，艺术家异彩纷呈，探索创新蔚然成风。特别值得提及的是有不少作家艺术家自觉地坚持与时代同步、和人民同心，他们的作品与变革中的现实生活的脉搏息息相通，与在改革、开放大潮中阔步前进的人民大众共呼吸，因而激励着、也吸引着万千读者，从而使文学艺术在新的时代增添了蓬勃的活力。但也要看到，近几年来，在文艺界，脱离现实、脱离传统、脱离群众的现象确有发展之势，已经引起了人民群众和许多作家、艺术家、评论家的关切和担忧。诚然，文学艺术绝对应该是创新的领域，在文学史、艺术史上，凡是卓尔不群的人物没有一个不是给文学史、艺术史提供了新东西的，没有创新就谈不上真正有成就的作家艺术家。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在于什么样的创新才是值得肯定的、真正的创新，才是合乎历史和艺术的发展规律，从而才能符合今天时代所需要的创新。文艺发展史告诉我们：给文学艺术的发展增添新东西，总的不外乎思想内容和表现形式两个方面。艺术形式的开拓和创新是有重要意义的，但首要的是思想内容的开拓和创新。因而只有形式服从内容、内容和形式相统一的创新才是完全的、高层次的创新。文艺发展史还告诉我们：任何艺术观念的变革和艺术形式的创造，其成败都不是仅仅凭文艺家自己的主观设想就可以论定的，也不是仅仅从“纯艺术”、“纯形式”的角度就可以说明的。它必定要接受社会生活和时代发展的影响和检验，必定要接受人民群众理解和喜爱与否的选择，同时也必定要接受继承与创新的辩证关系等一系列艺术规律的制约。因此，真正有长久生命力的艺术创新，总是同真实、正确、深刻地反映时

代面貌、表现时代精神、具有进步的或革命的思想内容分不开的，总是同能为更多的群众所理解和喜爱分不开的，因而，也总是同适应群众的审美要求而必然会具有的民族性和继承性分不开的。正是这样，作为人类文艺发展史上一个崭新阶段的社会主义文艺，自觉地把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作为它的一个重要观念、一个指导原则，这难道不是合乎文艺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吗？难道不是恰恰和真正的创新相一致的吗？相反，如果以“创新”为名，根本否定社会主义文艺的革命性、民族性、群众性，那将会是怎样的“创新”呢？如果割断文艺和社会主义时代、和改革开放历史大变革的联系，否定了作品中应具有革命性的思想内容；如果文艺远离了人民群众，根本不表现人民的生活和心愿；如果文艺完全抛弃了民族传统并丧失了本民族的一切特点，甚至完全不为人民群众所理解，那么，这样的“创新”，恐怕是不能作为否定“三化”有力论据的吧？可不可以说：这不仅不是什么真正的创新，倒还可能是复旧的表现，因此，总不是我们应当赞扬、提倡和推广的吧？当然，在大变革时期，出现这种现象是不足为奇的。社会主义时代的文艺和已往所有时代的文艺一样，不仅会是多样的，而且在多样化之中出现消极的东西也是不可避免的。所不同的是，在科学世界观、文艺观和正确的方针政策指导下，经过自觉地努力，经过历史的、群众的鉴别，消极的东西总会被克服，在多样化的发展中必定会有更能代表时代主旋律的东西成长起来，或迟或早地会形成文艺发展的主流。而“三化”这一指导原则，正是有利于促进正确的主流在多样化的配合下向前发展的。这些年来来的情况表明：消除了从“左”的方面对“三化”的曲解和别的误解，它已经和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一样，为我们大多数同志所理解并掌握了。事实上，许多有社会责任感并正

确握掌创新精神而不是“玩”文学、“骗”文学的作家和艺术家，早就在不倦地实践着这些原则、追求着这种境界。事情并不象有的人认为或宣示的，文艺走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道路，就妨碍了艺术创新，就玷污了文艺的圣洁之躯，就使文艺变得陈旧不堪、粗俗不堪、浅陋不堪，就流于低层次、浅层面。不是这样。“三化”是有利于艺术创新的，是对文学艺术创作的很高的要求。真正达到了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要求的文艺作品，是能够被雅俗共赏的。有同志争论说雅俗不能共赏，这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尽管还会继续争论下去，但事实是雅俗共赏作为一种高层次的审美境界，并不会因为有人不承认就不复存在同行们，让我们继续用更大的努力追求这种境界吧。

《中国大众文学丛书》编委会在丛书第一批出版之际要我为之写序，谨奉上寥寥数语，是为序。

贺敬之

一九八八年三月

主 编
马 烽
编 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马 烽 于庆林 冯育楠
冯骥才 刘士俊 刘永康
刘锡诚 刘绍棠 刘国玺
闰 纲 玛拉沁夫 杨亮才
张凤洪 孟伟哉 林友光
赵铁信 修玉祥 浩 然
焦勇夫

责任编辑

韩光玉 吴丹青

装帧设计

陈 新

爱，往往来不及寻找原因，有时候，一个偶然，两颗心就相撞了，但要迸出火花，还得靠双方心灵的感应。这一男女间的谜，不管是城市里的，还是农村里的，都是一样。男男女女有了十八九岁，心里就象虫儿在钻。他们不要民间办训练班，更不要官方开现场会，只要“产品”对路，就会互相“撞”起来。一旦过了二十三四，如果没有“撞”上，还是光棍一条，那他自己会闷着急，父母呢？就会公开着急了。

于是就千方百计想办法到这里请人，到那方接客，“高射炮”、“机关枪”、“集团军”、“游击队”，各种兵力，各种武器，全部出动，“瞄”对象，“打”媳妇。为什么这样兴师动众？因为年纪一大，就很难找到一个称心如意的了——尤其是女人。

姜永顺的大女姜静，人，长得挺漂亮，用城里人最时髦的话讲，她象一朵牡丹花儿；用乡里人的土话说，她生得象个糯米粑粑。

她从二十岁起，说媒的，上门的，前前后后四五年了。但婚姻之桩象钉到了九层地狱，怎么也动不了。为这事儿，她心里象塞了一块石头，吃也不舒服，坐也不安稳。

她家住在孟姜村。

孟姜村这地方真有点怪，并且怪到了如此的地步：男人老老实实憨憨厚厚；女人呢，个数个都长得象初出水的荷花那样水灵，漂亮得如同仙女，并且都有一手媚人的本事。不管是十七八岁的闺女，还是三十五六的大嫂，只要外地的男人一到这里，少则一天，多则三天，她们就象万能胶一样，把他粘住。一旦被那些荷花仙子粘住了，天啦，就是用几十匹马力也拉不开。最后到底怎么办，这里头的经路就深了，谁也说不清。不过，他们这些仙子也是看对象的，决不会萝卜、稻草一把粘，粘的男人一般都是有钱的，有权的……

孟姜村女人的名声在外地相当不好。只要一提起这个村里的女人，没一个不摇头。

外地的女人如果听到自己的男人要到孟姜村去办事，她们就会跳起脚来骂，不管男人怎么赌咒发誓，也不会让他去。就是去了，也要把他追回来。

在这个乡工作的干部，很少到那里去，万一有事，也是三五个人一同行，大都清早去，煞黑就回家来了。不在那里过夜，更不会在那里住上三五天。听说，在“文革”中，孟姜乡（当时叫孟姜公社）有个“走资派”，被“造反派”斗得没法过了，想到孟姜村躲一躲。他跑到那里没两天，就被一个最佳万能胶粘住

了。这件事本来没人晓得，也没有人怀疑，因为他是个挨斗的“走资派”，日子都难混，命也难保，群众都以为他不会搞那些鬼事儿。可没隔几天，“最佳万能胶”和一个女朋友讲出来了。她认为粘到一个公社的领导，是她的光荣，很得意，讲出来体面。

“走资派”躲到孟姜村，跑到人家女人的床上去了，这事本身就有很强的新闻性。加上那几年人口流动量大，一人传十，十人传百，比风吹还快。当天就被公社革委会的造反派司令听到了。他立即带了三个“卫士”，开着一辆用手扶拖拉机改装的“伏尔加”，把“走资派”抓住了。司令办事果断，当场就把他打了几耳光，鼻血满地流。一拖到公社，连夜就开批斗会，宣布开除了他的党籍，撤销了他的职务。后来在落实政策时，由于他确实犯有男女关系错误，上级党组织也就按原来的处分作了结论。

从此，孟姜村这地方就成了乡里干部的一大禁区，没一个人敢闯了。每次县里开会，上级有精神要贯彻，怎么办？一是通知孟姜村的干部到乡政府领文件，自己去贯彻；二是没有文件的会议，就用电话给村干部传达。

姜静的对象难找，倒不是说她的品质不好，有“胶”在身。要说，在孟姜村这块地方，她还算是个有文化，有教养，有健全体魄，有思想的好闺女。原因就是她家底太薄，太穷，没有钱。

她没有哥哥和弟弟，只有一个妹妹。父母亲不同意她出嫁，放在家里招郎。

说起招郎，孟姜村这地方不是不兴，也是有习惯。不过，凡是去做招郎的，大多数是家里弟兄多，条件差，找媳妇有困难。

做招郎，目的是要找个好媳妇，找个好家庭。一生不愁吃，不愁穿，过美满幸福的好日子。可姜永顺的家里却穷得经常揭不开锅盖。有几次，媒人带着长得标标致致的后生到家里，一看一了解，说上几句客套话，茶也不喝一口就走了。这还是讲道理、懂礼性的。有的青年人说话不顾影响，当着媒人的面就说：“我从来坛里跳到糠钵里，何苦呢？”说得媒人无处藏身，只好红着脸，低着头，咽着冷气收场。

近一段时间，姜静的身体不算好，从农历三月初三到十二，就病了两次。也怪，她每次起病相当急，并且都是在半夜里。一开始就是发冷，冷得磕牙，盖几床棉被都难镇住。约摸一刻多钟过后，又发烧，烧得烫手。挨天亮时，她的病又好象没事似的，当吃饭时吃饭，该做事时做事，一切照常。

住在孟姜村东南边有一个叫陈久发的老馆子，是个看相的，解放前以看相为生。后来在破除迷信的运动中洗手不干了。可近几年，他又活跃起来。一天早饭后，太阳被雾罩住了。罩得村里的房子都看不清。叶大妈心中来计，把陈久发老馆请到自己屋里，给孙女姜静看个相。

姜静也不明白陈久发的来意，和他闲谈着。她走后，陈久发装出一副严肃脸面对叶大妈说：“大婶子，这可不得了，姜静这孩子被三十八年前一个疯死了的男人缠住了。”

叶大妈听他这样一说，慌神了，眼泪汪汪地问：“久发兄弟，他缠住她做什么呢？”

“他要和她结婚？”

“结婚？”叶大妈从椅子上站起身，走到陈久发面前，猫着身子问。

“是呀，这是个难办的事呐。”

“有什么法子治没有？”

陈久发头几摇：“难。”

叶大妈犹豫了一下，走到房门边看了姜静一眼。

姜静走到门边来了。

叶大妈快步走到陈久发面前，给他做了个手势，两人走出了大门。

浓雾弥漫着，整个村子空寂无人。时而听到狗的叫声，时而听到猪的吼声。她那恍惚茫茫的目光凝视着恍惚茫茫的村庄。

当天中午，叶大妈就把这一“内部机密”告诉了儿子姜永顺。

姜永顺死活不信。他认为女儿可能是为婚姻问题，想得过多。他的打算：找亲戚帮忙，给她尽快找个合适的对象；再就是借点钱，把她送到医院治一治。等病好了，让她结婚。

这段时间，姜家一屋人都在对姜静的病发愁。尤其是叶大妈，为这件事急得头昏脑胀，昼夜难分。

姜静这孩子平时对她的祖母特别孝敬。有时上县城，回来无论如何都要给祖母买点好吃的。为了不让嘴馋的妹妹发现，等妹妹睡了才把东西放在祖母的枕头边，并且站在她身旁守着，等她吃完了才离开。叶大妈对她也是当命儿心肝看待，深怕她生了病。

姜静的妹妹姜利利看到姐姐患病了，睡卧不安。这几天，她没等天亮就爬起床，把猪栏里、屋前后打扫得能看见落在地上的绣花针。猪栏里的粪、杂草出得一锹不剩，一根不留。有的岩板脊里夹着一点猪嘴掀掉的食渣，都用水冲洗得利利索索。屋檐沟里的污泥浊水，全用锄头刨走了。然后又在沟里，水码头，厨房里的泔水缸周围，全部撒了一层石灰。

晚上，叶大妈看孙女在稻场里乘凉，便到屋里找些艾叶来熏烟，驱赶蚊虫。有时怕蚊虫赶不走，她就坐在姜静的身边，用芭蕉扇给她扇。等她们进屋里睡了，她才上床。

天底下的事就是这么怪，往往最怕什么，就会发生什么。叶大妈上床入睡不一会儿，就做了一个梦：孟姜女到她屋里来了，没有进大门，是从屋山头的架子窗里飘下来的，直接飘到内房里。稍站了一下，孟姜女用手轻轻地把她的帐檐门扒开，小声地说：“……老人家，赶快起床，你的宝贝孙女儿又起病了哟……”说完，轻轻地把帐门放下来，然后在她的身边象云雾似的腾起，把手一伸，脚一抬，一溜烟飘走了……

叶大妈听说孙女姜静陡然起病，简直没命了，脚慌手乱。她脚一蹬，亮开嗓门，用力喊老伴姜雨湖赶快起床，要和他一同到孙女的睡房里看看。

谁知她没有把老伴喊醒，而自己却被惊醒了，被子掀到床下边，一双手搁在床沿上，心里蹦跳着。

“是在做梦！做梦！”叶大妈侧着身子清醒地想。一会儿过后，她睁开眼晴用手把帐门撩开一看，屋里屋外黑洞洞的。再往房门那边看去，门边象是站着一个女人，头发披着，凝望着她，脸面看不清。她不禁打了个寒噤。

莫非是真的？她朦胧起来了。顿觉有点害怕，一双手发着抖，摇摇摆摆地把撩起的帐门放下来，扎在床沿边的被絮里。用手揉了揉几下惺忪的眼睛，在额上推了三掌，故意咳嗽两大声。叶大妈精神为之一振，门边的那个女人也随之消失了。

又象真，又象假，在真真假假面前，叶大妈模糊了，她坐起来，披上衣，隔着帐门几大声喊醒了睡在下边床上的老信子姜雨湖。

她喃喃地说：“刚才……”

姜雨湖没等她说完，插话道：“老妈子，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别罗嗦，睡！……”说着说着，鼾声又响起来了。

“这个鬼老倌……唉！”她怨恨地叹了一口气，穿上衣，从床上爬起来。刚一下床，一脚踩到了放在床边的小便罐，“咣当”一声，把老倌子惊醒了，尿臭冲天而起。

姜雨湖长着一张刀子嘴，稍一遇到不顺心的事，三句话能把人的脸说出血来。他把被窝用脚一掀，猛地从床上坐起来，揉了揉鼻子，把帐门一撩，冲着说：“老妈子，你发疯了！一天到黑就是鬼的神的……是谁叫你没日没夜疯癫的？！好哇，是不是尿罐鬼在喊你？！姜静这丫头……”

叶大妈只顾去收捡便罐，没理姜雨湖。她任他怎么挖苦，耐着性子听着。

姜雨湖是个不肯人云亦云的人。叶大妈从二十岁和他结婚起，就摸透了他的性格，他说话直着来，直着去。火性子一来，什么话都说得出，气消了，事过了，他象得了健忘症似的，什么都记不起了。叶大妈刚满十八岁那年，是她家族的一个叔叔做的媒，一年后就和姜雨湖结婚了。姜雨湖从十五岁起就跟他父亲学杀猪，至今实打实算有五十个年头了。杀猪刀用了十多把，猪血盆子也用坏了五六个。他杀猪的手艺，在孟姜村这一带是呱呱叫的。他杀猪除了猪身刮得雪白，无一根毛外，猪头也搞得相当利索，就是再喜欢挑剔的买主也难得挑出毛病来。买到家里用清水冲洗后，立即可下锅。

姜雨湖不仅杀猪的功夫好，卖肉也有他的绝招。他在码头上卖肉，一般情况下是不带秤的。三十斤也好，半斤也好，他就是——一刀。一刀砍了，用草绳子把肉系好了交给买主，不管你到哪里

去过秤，一两不多，一两不少。

1978年腊月，地区肉食部门搞了一次卖肉技术大比武。首先，领导上要求全区各级肉食站在职工中挑选最佳的杀猪能人参加，凡获得头名的，可得三百元奖金和一面大锦旗。

孟姜乡肉食站有两个师傅，他们虽说有了十多年的杀猪历史，但近几年，单位杀猪搞了些新套套：运肉开汽车，杀猪用电触，称肉用磅秤。杀猪师傅平时很少用手提秤环子，一斤肉最少都要砍两三刀。

当领导的心里明白，象那号手艺，根本不能参加比武大会。但上级业务主管部门再三强调：每个单位都得有人参加。如果哪个单位不参加，不仅要受到批评，还要拿出五百元钱奖给搞得好的单位。职工要一齐出动，敲锣打鼓给得奖者送去。

孟姜乡肉食站的站长边风搞慌了神。一天晚上，他冒着细雨赶到姜雨湖屋里，说明了事情的原委，然后要请他代表孟姜乡肉食站参加。

姜雨湖一听不对劲，刀子嘴一张，说道：“老边，你这当的哪方的干部？”

边风一听傻了，直着眼望着姜雨湖不好再开口了。稍沉思片刻，轻声地问：“您问的意思……”

“共产党跟你头顶上安帽子，你就这么戴的？这明明是假的嘛！”

边风狡黠地一笑，马上给姜雨湖递了一根烟，边划火边说：“哎呀，我的姜老师傅，你就太认真了，如今哪有好多真的……你忘了，大跃进那几年，亩产稻谷十万斤，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吧？”

“不知道。”

“那是把别人几块田里的熟稻子移到一块田里的。”

姜雨湖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奇闻。但他不相信。重重地吸了一口烟，说：“你在哪里听来的？我不信！”

“老师傅，何止于此，远的不说，说近的，我们县里报棉花产量……人均收入……计划生育都是假的……”

最后姜雨湖被边风霸蛮死缠，实在没办法了，同意了他的要求。

比武那天，姜雨湖穿着孟姜乡肉食站给他发的白的确良工作服，靠左胸上面印着“孟姜乡肉食站”六个行草红字。

他想：“一夜就转正啦，转成了国家职工。可惜好景不长，比武一结束，我这白褂子，就会改变颜色呀！唉，搞得象什么话哟！”他越想越觉得好笑，便暗暗地骂道：“娘的，拆共产党台的混帐东西！看你们做得出来！”

为了不影响比武场上的情绪，姜雨湖还是一本正经地干起来了。

他手持砍手，严肃地站在肉案边。

他身边没有搁秤。

称肉的顾客都觉得有点奇怪，数百双眼睛盯着他。一会儿，称肉的，试他手艺的，看热闹的，同行们为他捧场的，一起都拥到了他的案边。

人，越来越多。

比武开始了。

姜雨湖不慌不忙，按排队的顾客自报的斤两，一刀一个主，一口气连砍了三十刀没有停手。边砍边风趣地说：“大家不要慌，等给同志们砍完了，我再来按砍的斤两收钱，不会耽搁你们的事的，砍起来快！”